

胸懷亞洲——從 蔣中正 1942 年 視察印度西北邊 防組照談起

廖文碩 國史館助修

一、視察印度西北邊境防務

圖 1 為蔣中正 1942 年 2 月訪問印度的檔案照片，係蔣一行人前往印度西北與阿富汗邊境開伯爾山峽（Khyber Pass）視察英屬印度邊防和國防動員準備工作時所攝，蔣的左側為侍從參謀皮宗敢，右後方為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商震。照片收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之〈總統蔣公影輯一出國訪問〉卷。蔣氏夫婦與隨員十餘人於當年 2 月 4 日自重慶出發，經昆明飛往緬甸，夜宿臘戍（Lashio）；5 日抵達印度東部第一大城、英屬印度孟加拉省省城加爾各答（Calcutta, Bengal）；9 日至英屬印度首府、位於印度中北部的新德里（New Delhi）；13 日拜訪印度西北前線省國防重鎮白沙瓦（Peshawar, North West Frontier）及一小時車程之外的開伯爾山峽；14 日赴英屬印度判查布省省城拉化（Lahore, Punjab），傍晚返抵德里，結束西北參訪行程。17 日重回加爾各答，21 日飛離印度。

蔣中正訪印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未幾，日軍厲行南進政策，在太平洋區內對盟軍發動大規模攻擊，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英、荷、美殖民地，新加坡方為日軍所攻占，馬來亞、爪哇岌岌可危，而中南半島越、泰已相繼淪入敵手，緬甸情勢告急，戰火直逼印度。其間日本在東南亞各地宣傳反西方帝國殖民、號召「亞洲為亞洲人之亞洲」大亞細亞主義思想，在印度與抗英獨立運動合



圖1 蔣中正 1942 年視察印度西北邊防組照之一 (典藏 / 國史館, 以下同, 省略標註)

流，鼓動印度流亡民族主義者及日後所組印度國民軍 (Indian National Army) 倒向與軸心國結盟，同盟國在軍事、政治上頗處於劣勢。(註1) 作為國家領導人的首次出國訪問，蔣訪印的直接目的，在「勸英印互諒互讓、勸印多出兵出力」，即與英印進行軍

事與政治合作，調解英印殖民宗主國與殖民地社會之間的政治矛盾，力促英印雙方接受印度進入自治領體制階段，消弭印度反戰情緒，使共同對抗法西斯侵略為主。(註2)

為促成盟國軍事合作目的，訪問英印軍政當局、進行中印運輸通信交涉、考察印

度西北邊防、研究英屬印度軍實情，為蔣訪印預定之相關重點工作課目。(註3)蔣先於2月4日在緬甸臘戌會見英屬緬甸軍總司令哈登(Thomas J. Hutton)，討論緬甸戰況與中國第五、第六軍預備入緬情形；9日於新德里會見英屬印度軍總司令哈特萊(Alan F. Hartley)，聽取印度軍隊實力概況報告，主要包括印度軍組織概況、邊防部隊分配、印度兵源分配情形、境內保安部隊整編情形等。(註4)按哈特萊係於1942年1月至3月間，短暫接替時任美英荷澳聯軍總司令魏菲爾(Archibald Wavell, Commander-in-Chief of American-British-Dutch-Australian Command)出任印度軍總司令職位，3月魏菲爾再兼任印度軍總司令，哈特萊回任印度軍代理總司令。關於2月13日赴印阿邊境開伯爾山峽行程，蔣在日記有如下敘述：

十時由新德里乘飛機一時到白沙瓦，此為西北國防之根據地。入省長公署，午膳後乘車，直往「開伯爾」山峽約一小時，到印度與阿富汗邊境，特起上其國境碉堡內參觀內務寢食各具，皆極簡單，遙望阿境內層巒高峰積雪甚厚，可知其氣候之寒也，登碉樓眺望約一刻時乃即回程計十五分時即到其旅部所在地，參觀其新兵訓練後，再乘車二十分時到山口伽姆羅達受「阿富汗提」等族歡迎會，到會者皆酋長，約百餘人，牽羊歡迎，余摸其羊頭表示謝意，此為其

習俗也。該族酋長那華、白、摩特、柴曼、甘士等致歡迎詞，余答詞如儀(另錄)，余於此實有無窮之感。蓋此等民眾三十年以前，皆為我之國民，大部以「不丹」、「錫金」人為多也，故余不禁稱之為同胞。有年老至八十歲者，彼必知其為中國人也，惜彼此皆不通語言，且有省長在座，余亦不便詳問，而余此次來印以此為唯一之快事也。(註5)

開伯爾山峽為印度西北方興都庫什山餘脈鞍部切口，今屬巴基斯坦。開伯爾山峽以其特有地形與戰略位置，地扼印度中部大平原咽喉，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是歐洲、近東、中亞國家進出南亞大陸的戰場與商貿活動通道。當地游牧部族如赫日誌所述阿富汗提族(Afridi)等林立，驍勇善戰。19世紀上半葉此地曾為錫克帝國(Sikh Empire)、阿富汗帝國(Afghanistan Empire)所據，然而隨著英、俄帝國擴張、爭奪勢力範圍，雙雙覬覦阿富汗，此地武裝衝突不斷。(註6)第二次英阿戰爭(Second Anglo-Afghan War, 1878-1880)後，英國占領開伯爾山峽，招撫阿富汗提族戰士，組成名號「開伯爾步槍團」(Khyber Rifles)的後備邊防部隊，族人配備長槍，著傳統白袍，帽頂紅色三角布巾為其標誌。20世紀初葉第三次英阿戰爭後，由於英國殖民政府財力不支及族人忠誠度被質疑等因素，步槍團遭解散，部分編入正規英屬印度軍。圖1



圖2 蔣中正 1942 年視察印度西北邊防組照之二

照片著錄僅作「總統蔣中正訪問印度各處留影」【典藏號：002-050103-00007-010】，蔣檔〈總統蔣公影輯——出國訪問〉同卷收入相似場景照片，內容著錄為「總統蔣中正在印度白沙瓦開泊爾山口受當地民團歡迎」【典藏號：002-050103-00007-023】，復與英國官方檔案照片比對，（註7）應可確定圖1為蔣於2月13日訪視開伯爾山峽國境邊防時所攝無誤。照片上的印度民團，從衣著推測極可能為阿富汗提族人，照片後方為開伯爾山峽要塞碉堡，如蔣日記所述山峽東面入口伽姆羅達關（Jamrud Fort）係19世紀陸續興建形成的大型堡壘。

2月14日，蔣由白沙瓦啟程，前往判



圖3 蔣中正 1942 年視察印度西北邊防組照之三

查布省省城拉化參訪。關於當日行程，蔣有如下記述：

九時乘飛機，十時半到「拉化」，即「傍遮普」之省城，參觀其新兵訓練，多可取法，再參觀其陸空軍軍官預備學校學生之食宿及其倉庫營房與築路機器後，閱兵畢已一時半，入省署午餐。三時由拉化起飛，途中瞰視 FELOZEPOR 水壩，乃為其重要工程也。五時到德里，回寓休息。（註8）

按「傍遮普」為判查布省別譯。圖2、圖3收入蔣檔〈總統蔣公影輯——出國訪問〉同

卷，圖2照片著錄僅作「總統蔣中正訪問印度各處留影」【典藏號：002-050103-00007-008】，圖3作「總統蔣中正訪問印度時參觀士兵槍械示範」【典藏號：002-050103-00007-009】，從兩張照片中人物與衣著相互連貫判斷，應為同日前後所攝。圖2最右者作時下一般印度衛兵穿著，蔣右側的印度軍官包頭、蓄鬚，為錫克族人（Sikh，或譯雪克族）重要特徵，錫克族主要即分布在判查布省。對照日記內容，圖2、圖3似乎可能是蔣在拉化參訪時的留影。蔣對拉化一地有如下感想：「拉化為印度出兵之地，其土地肥美、氣候寒熱皆異常，故其士兵能耐極寒與極熱也。英人得此寶地，如何能放棄也。」（註9）

蔣赴印度西北，目的為視察邊境防衛準備工作。返回新德里後，蔣於15日再會晤先前已拜會的英屬印度總督林里資哥（Victor A. J. Hope, Marquess of Linlithgow）討論日軍侵略動向及杜絕德、日軍隊會合等問題，另於15、16日兩度會晤英屬印度軍總司令哈特萊，聽取並討論印度防衛計畫。關於印度邊境防務，哈特萊對蔣有如下表示：「關於閣下所去視察的西北邊境，在歐洲戰事剛發生的時候，因為顧慮蘇俄，我們對這個地方非常注意，現在俄軍已拒德人於高加索山之外，離我們有相當的距離，過去的危險顧慮是沒有了。現在我們東北方面的危險則顯得很大。」（註10）哈特萊與印度軍參謀長等人評估日軍進犯印度東北

的可能性較南部錫蘭為高，主要著眼於印度東北部有加爾各答及附近一帶的重點工業區，且海岸線綿長，而日軍在緬甸摩爾門（Moulmein）已有空軍根據地，推測日軍以空軍、海軍、登陸部隊等侵攻印度東北部的可能性極高，惟目的可能只是在擾亂東北及工業中心而已。而印度南方錫蘭（Ceylon）僅為次要城市，對日軍而言路途遙遠，尚且有遇見英國主力艦的危險，日軍進犯的可能性較低。（註11）

蔣雖向哈特萊等人一再謙稱對印度的地理知識與軍事、政治、社會民情等所知有限，然而檢視中方記錄蔣所建議印度戰略，相較之下其實看法頗為全面。與哈特萊等人看法相左，蔣推估日軍若進攻印度，首先將侵犯錫蘭，錫蘭失陷後，則東部大港孟買（Bombay）、卡查克（Katchak）亦將成日軍囊中物，德軍再從近東推進，則日、德會師是指日可待了。由於印度所需保衛的海岸線過長、印度軍隊明顯不足，海道交通顯然遲早靠不住。蔣因而主張，印度防衛工作務須堅守陸路，集中實力於東北及西北少數重要的戰略據點，東北及西北陸路交通線絕不能受阻，必須不惜代價分別在東北及西北方面保持與中國、蘇聯軍隊的聯絡。蔣向哈特萊保證，只要印度的陸路交通與中國保持接觸，則損失一些城市或據點，也是不足為懼的。（註12）當然，維持中印陸路暢通也是為了確保中國長年對日作戰以來少數僅存的國際交通孔道，此刻美國租接法案物資已部

分改運往孟買、卡查克，在滇緬公路、印度南部海路面臨封閉之際，中印公路已開始進行勘測工作，印度東北陸路是中方必須極力爭取保存的補給線。蔣在當天日記寫下：「往印度軍總司令部訪哈特雷總司令，告以印度目前應取之軍略與要點，特別注重錫蘭島防務與其東北及西北之防務，觀彼無甚決心，聞余言，乃使彼得以決定處置也。機關與精神皆未見其有戰時狀態也，可慮殊甚。」（註13）對哈特萊等英國高級將領在印度軍事準備情形甚感憂心。

二、關注印度地方政治

視察印度軍事實情之外，蔣此行的另一重點工作，在勸說英印各黨派互相諒解合作、化解矛盾，使其共同對抗軸心國外侮。自2月5日抵印至21日離印期間，蔣及隨員馬不停蹄地會晤了英屬印度政府、政黨與民間各界要人，大致可分類如下：(1) 英屬印度政府中央大員：包括總督林里資哥，民眾國防部、工務部、交通部、教育農林衛生部、勞務部等各部部长；(2) 英屬印度政府地方官員：包括孟加拉省長赫白脫（John Herbert）、判查布省政務長官雪甘大雅脫堪（Sikandar Hayat Khan）等；(3) 英屬印度最大政黨組織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領袖：包括主席阿柴德（Maulana Azad）、委員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甘地（Mohandas

Gandhi）等；(4) 地方王公貴族與部族領袖：尼泊爾國王公子、各土邦王公、土邦王公聯合院院長、土邦貴族聯合會主席、西北部落族長等；(5) 宗教領袖：印度回教同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領袖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等；(6) 工商界、僑界與文化界人士：加爾各答鋼鐵業大亨、華僑代表、華裔學者譚雲山為中心的泰戈爾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人士等。其中蔣與領導獨立運動的國大黨領袖甘地的會面安排尤為曲折，由於甘地所倡導不服從、非暴力的和平變革思想屢屢與英國殖民政權衝撞，受到國際間的普遍關注，地位特殊，英方為恐提升甘地名望，除了要求蔣氏夫婦與國大黨人士會面必需在會見英國官員之後，對於兩人與甘地的會晤日期、地點等一再干涉，尤其反對蔣逕赴甘地居住地華達修道院，甘地曾一度放棄見面機會，後在蔣的堅持與尼赫魯的居中協調下，改於加爾各答甘地友人寓所會面。

大英帝國自19世紀下半葉統治印度以來，面對印度境內複雜的宗教、種族、地域差異，一向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經年累月嚴重加劇了各集團間的隔閡與衝突。（註14）蔣到訪的印度西北判查布省、東北孟加拉省，因回教徒及土邦眾多，與印度主流社會截然有別，分離意識尤其強烈。英國殖民當局如總督林里資哥、孟加拉省長赫白脫等一再向蔣強調，印回之爭是造成印度社會內部分裂、1935年印度憲法所規劃聯邦制度無

法實踐、以及印人難以全力襄助英國作戰的主因。依據中文談話紀錄，赫白脫向蔣提及回教領袖真納有所謂「巴夏計畫」，擬創設回教自治區，此即知名的印度回教同盟「拉化決議」（Lahore Resolution），別稱「巴基斯坦決議」（Pakistan Resolution）。（註15）該決議起因於1939年9月英屬印度殖民政府片面對德宣戰，引起國大黨人強烈反彈，國大黨向英方要求印度即刻獨立、籌組制憲議會遭拒，民選8名國大黨籍省長隨之宣布辭職，反觀回教領袖真納則傾向對英合作妥協、不反對參戰，英國遂行攏絡分化手法，大幅拉抬真納地位，默許印度回教同盟於1940年3月在判查布省省城拉化通過回教自治區決議。（註16）2月17日，蔣在英方安排下於加爾各答會晤真納，真納也強硬表示印度教徒、回教徒不能和諧相處，無論政治、宗教、乃至日常生活皆隔閡已深，嫌隙難弭。蔣在當天日記中直言：「此人言行實為下等無賴之流，殊堪嫌憎，勉強與之間談半小時而別。英人利用之人乃如此者，更可證明英人所宣傳印度教與回教不能一致之非事實，真正愛國之回教多傾向於國民大會與甘地主義也。」雖因策略與情感上支持印度民族統一對外，而明顯偏向國大黨，對於英、印、回三方的明爭暗鬥，也頗能洞察一二。

三、印度行背景與意義

從宏觀角度詮釋蔣的印度行，近年來學界研究運用新開放的《蔣中正日記》等資料，結合歐美相關研究為基礎，著重詮釋蔣中政的政治與外交目的，並擴大探討相關背景與歷史意義，提出若干重要層面剖析，茲分別彙整，並加以補充闡述如下：（註17）

（一）反帝國殖民與聯合亞洲民族思維下的中、印政黨聯繫合作

中、印近代皆淪為被西方帝國壓迫民族，早於19、20世紀之交民族主義覺醒、民主思想勃興的世界性浪潮推動下，追求民族自決、爭取獨立解放，激發中國反清與印度反英革命志士彼此間同仇敵愾、同聲相應的共識與情誼，孫文、章太炎與印度革命家聯繫尤為密切。1924年11月，孫文於日本神戶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講，力倡恢復亞洲民族地位，以仁義道德為基礎，聯合亞洲各地民族，印度民族主義者多所響應。（註18）日後蔣中正閱讀該講稿，遂有發揚孫文所倡東亞仁義道德王道、使普及全世界的自我期許。（註19）1927年2月，由共產國際主導組織的世界性「反帝大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成立大會，共有30餘個被殖民國家受邀參與，中國國民黨在聯俄容共政策下也成為同盟支持者，黨中央執行委員宋慶齡與來自歐美各界的國際知名人士如愛因斯坦、高爾基等為同盟主要發起人。會議期間，印度代表國民大會黨左翼領袖尼赫魯曾與宋慶

齡、奉派為國民黨駐該同盟代表的中共黨員廖煥星等人密切接觸，就中印聯合與交流辦法進行討論。然而其時國民黨左右路線之爭走向清黨與國共絕裂，尼赫魯等人的中印合作計畫發展隨即面臨困境。

中印政黨領導人正式互訪始於尼赫魯1939年8月下旬造訪重慶，向蔣中正提交「發展中印關係意見書」，表達國大黨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同情與支持，雙方並議定「中印文化合作辦法大綱草案」、「中印合作與組織辦法」，中方原則以表面上借託文化合作事業方式，樹立中印合作根本基礎，進而發展政治上的實質合作，一切合作活動俱由中國國民黨及國民大會黨負責實際策動。同年11月，時任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受蔣命以中國國民黨代表身分出訪印度，正值尼赫魯抗議英國參戰未得印人同意，從事反戰宣傳而入獄，戴曾傳達蔣勸諫國大黨與同盟國合作，爭取國際同情之意。另一方面，毛澤東與尼赫魯早於1938年促成印度援華醫療隊，提供八路軍援助，尼赫魯在重慶期間曾會晤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並受邀拜會毛澤東，因二戰爆發致印度國內急務而不克成行，惟尼赫魯與國共雙方均保持聯繫。

（二）以「中印學會」為橋樑的中印文化交流發展

新文化運動時期，印度文豪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受邀訪華，所倡博愛和平精神與其文人哲思風範風靡一時，

曾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高峰。1934至1935年間，由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與泰戈爾所創辦「中印學會」分別於印、中成立，為雙方建立常態互動管道與人際網絡的里程碑。承繼1920年代與泰戈爾等人的學術文化交流前例，中印學會旨為振興中印文化，考量印度局勢而刻意避免政治糾葛，偏重宗教文化活動。中方由蔡元培、戴傳賢、朱家驊等先後出任理監事長，網羅政界、學界、文化界等名流，頗得官方支持，然而實際活動有限；而譚雲山受泰戈爾委託在印經營中印學會，並主持與泰戈爾所共創之國際大學中國學院（Cheena Bhavan），成為往後二、三十年間中印之間聯繫的重要橋樑之一。蔣中正於出訪印度前夕，曾有感而發：「中印兩國歷史之關係已二千年，邊疆接壤界線甚長，民族亦為世界上之最大者。然而從未發生衝突或武力戰爭之時，亦有文化之溝通、禮義之往來，豈非全世界和平民族之最著者乎。吾願珍重此兩國之歷史而發揚光大之。」（註20）文化因素與歷史淵源是為中印關係發展的特殊而重要面向。

（三）戰時國際政治角力與亞洲秩序重構

1941年隨著蘇德戰爭與太平洋地區緊張情勢升高，美國總統羅斯福標榜反殖民主義的道德與思想訴求、以持久全面的國際安全體系締造戰後世界秩序的構想，在1941年8月羅斯福與盟友英國首相邱吉爾簽署之「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得到落

實，成為盟國戰時合作的最初橋樑，也是盟國戰後合作的最初藍本。「大西洋憲章」倡言不擴張領土、民族自決、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政府形式、平等貿易等原則，首先衝撞了大英帝國既有秩序與殖民利益。邱吉爾隨即於英國下議院宣稱「大西洋憲章」不適用於印度、緬甸，而美國「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也激化了美、英在亞洲區域安全與貿易主導權的矛盾對峙。

未幾太平洋戰爭爆發，羅斯福力主「四強」架構——以美、英、蘇、中為維持國際秩序四警察，1942年元月由四國領銜簽署二十六國反法西斯侵略之聯合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蔣中正雖感個人與國家的地位與聲譽勝利空前，仍以中國國力積弱而對躋身四強表示慚惶，「甚恐有名無實，盜虛名而受實禍」，（註21）卻也亟思運用國際現勢主動出擊、擴大國際政治發言權，遂有2月訪印行。蔣訪印涉入美、英在南亞之競合，究竟是出於英方的主動要求，或是羅斯福的提議，抑或兩者皆有之，其間美、英對中國大國地位的不同認知、兩國要求或同意中國參與印度事務的分別意圖、蔣在美、英之間所扮演折衝角色等等曲折演變，似仍值得再仔細深究。（註22）訪印期間，蔣與英方議定殖民緬、印政府與中國互派半外交性質之代表常駐首府，並公開發表文告「對印度告別書」，呼籲擁護「大西洋憲章」與二十六國宣言。（註23）在離開印度前夜，蔣對於匆匆出訪，以致在政

治工作方面之進行，未能盡如所願，而深自反省：

此次來印對於印度近情未能觀測清晰，全憑英國之宣傳，以為英印間對於抗戰真趨一致也，又以準備不周與印督方面以及尼赫魯等各方面聯繫與洽商絕無，故彼此皆不接洽，以致誤會與猜忌之事叢生，此乃一生重大教訓之一，增進余之經驗不少也，不得謂之失敗。（註24）

對於印度軍事與政治準備情形，更感沉痛焦心，返抵昆明下榻處乃急電駐英大使顧維鈞轉達邱吉爾，據實告以印度軍政危急之情，次日又再電顧囑其對邱進言步驟，勿使誤會，又以電碼不密，囑顧以有線電轉知人在華府的外交部部長宋子文，顯見慎重之意。蔣另電令宋子文轉達羅斯福，告以印度各派不一致與英、印間不合作，主因在於英國對印內部分化政策，對印度情勢表示悲觀：

若英政府對印不徹底變更政策，無異以印與敵，而且誘敵加速佔印，思之憂惶。現在政情除自欺欺民之宣傳，文飾太平以外，毫無戰時之氣象，更無戰時之精神，南洋一帶失敗之速，其原因或即在此。而印之現情，自更不如南洋當日之準備矣。（註25）

蔣於昆明停留約一週後，再次飛往緬甸

臘戍，與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美國空軍志願軍隊長陳納德等商談緬甸戰事，3月5日始返回重慶。此間中國未能參加美英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五、六軍入緬助戰多所周折，而盟軍倉促應戰、彼此戰略互異、且軍令未統一，加以主力英軍士氣低落等因，終致盟軍在第一次緬甸戰爭以慘敗收場，中國軍艱辛跋涉退入印度。於此同時，英方所派出「克利浦斯特使團」（Cripps Mission）入印交涉合作，以談判不成宣告作終，甘地再發動大規模「退出印度」不合作運動（Quit India Movement），盟軍在亞洲軍事與政治各情陷於膠著。而蔣中正作為中國領導人，力主參與亞洲地區事務、協助亞洲被壓迫民族解放、並爭取對盟國合作有所貢獻，展現胸懷亞洲的視野與雄心，在首次出訪的印度行受到國際檢視與考驗，也為二戰後期及戰後國際政治發展埋下伏筆。

【註釋】

* 本文寫作期間，承蒙印度德里大學中國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Delhi University）Madhavi Thampi 教授、澳洲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er on China in the Worl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徐啟軒博士、國史館審編處吳恭全科長熱心協助解讀照片，筆者謹致誠摯謝意，惟文責自負。

1. Peter Ward Fay, *The Forgotten Army: India's Armed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942-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Introduction."
2. 蔣自述：「訪印目的：甲、勸英印互讓合作；

乙、勸印多出兵出力；丙、勸英允許印自治；丁、為將來中印合作基礎；戊、宣傳三民主義。」《蔣中正日記》，1942年1月30日，胡佛研究所藏。

3. 《蔣中正日記》，1942年2月8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4. 「哈特萊所具印度軍隊實力概況書面報告譯文」（1942年2月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 戰時外交（三）》（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1年），頁337-350。
5. 《蔣中正日記》，1942年2月13日。
6. John H. Waller, *Beyond the Khyber Pass: the Road to British Disaster in the First Afghan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7. 英國官方檔案照片可參閱 Chen Xueyi,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ang Kai-shek's Visit to India in 1942",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undated。另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有蔣訪印相關照片資料，因館方進行數位化作業，筆者未能加以對照檢視，為本文缺憾。
8. 《蔣中正日記》，1942年2月14日。
9. 《蔣中正日記》，1942年2月14日，「雪恥」欄。
10. 二戰期間，英國為防堵德軍南侵印度，於開伯爾山峽一帶佈置有反坦克水泥障礙陣，俗稱「龍牙」（dragon's teeth），至今依然留存於原址。
11. 「蔣中正聽取哈特萊報告印度防衛計畫談話紀錄」（1942年2月15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頁394-396。
12. 「蔣中正訪哈特萊陳述對於保衛印度之意見談話紀錄」（1942年2月1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頁399-401。
13. 《蔣中正日記》，1942年2月16日。
14. 呂昭義，《英帝國與中國西南邊疆（1911-

- 1947)》(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第11章「帝國的遺產」。
15. 「蔣中正會見赫白脫談話紀錄」(1942年2月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頁333-334。
 16. 1947年印度獨立,巴基斯坦成為英國自治領,真納出任第一任巴基斯坦總督。關於真納生平與政治抱負,西方學界有重要研究:Stanley Wolpert, *Jinnah of Pak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7. 近年研究主要包括:段瑞聰,〈1942 蔣介石訪問印度之分析〉,《民國研究》第16期(2009年),頁125-145;楊天石,〈蔣介石與尼赫魯〉,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2010年),頁300-331;Zhai Qiang, “A Passage to India: A Reappraisal of Chiang Kai-shek’s Wartime Diplomacy”, 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社,2011年),頁279-306;呂芳上,〈蔣介石——一位彈性國際主義者:以1942訪印為的討〉,《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7期(2012年5月),頁121-146。
 18. 近年研究如桑兵,〈排日移民法案與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演講〉,《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頁1-13,指出孫文演講係源於美國排日移民法案及日人相對「亞入歐」論的反省等背景,針對時局發議爭取日本國民與亞洲各國國民結盟,頗有新論。
 19.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臺北,1978年),頁88-89,1931年2月1日條。
 20. 《蔣中正日記》,1942年1月31日。
 21. 《蔣中正日記》,1942年1月,「本月反省錄」。
 22. 據蔣訪印隨行之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所言,訪印行為英國駐華大使卡爾所發動,而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有蔣訪印為應英國政府所請的說法;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王世杰則指蔣訪印提議之人為羅斯福。參見呂芳上、段瑞聰論文引註。關於蔣訪印與美、英的國際政治糾葛,美、英外交檔仍有許多資料尚未為過去研究所充分運用,因篇幅有限,擬待另文處理。
 23. 中華民國與英屬印度政府雙方互設專員公署,1942年4月首任中華民國駐印專員沈士華於新德里到任,隔年首任印度駐華專員梅農(K. P. S. Menon)始就任。戰時英屬印度政府首設駐外使館僅二處,其一於美國華府,其二在中國重慶,亦可見對華關係之重視。1946年升格為大使館,羅家倫、梅農各為首任大使,至1949年印度政府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止。
 24. 《蔣中正日記》,1942年2月21日,「本星期反省錄」。
 25. 「蔣中正電宋子文」(1942年2月22日),〈訪問印度〉,《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5-00005-029。